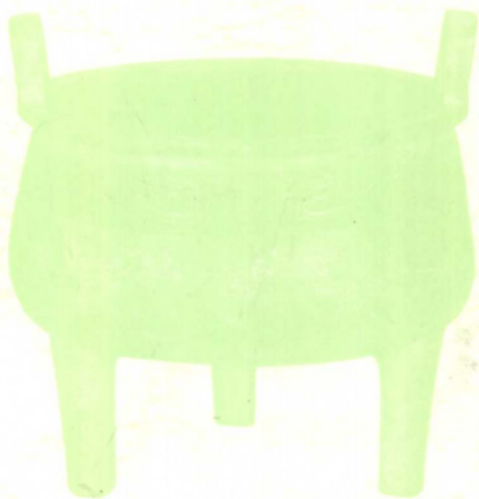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北宋中期
儒學復興運動

劉復生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ISBN 957-9400-84-9

2051 新台幣 200 元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北宋中期
儒學復興運動

劉復生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劉復生著．-- 初
版．-- 臺北市：文津，民80
面；公分．--（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9）
ISBN 957-9400-84-9（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北宋(960-1126) 2. 儒家 - 中國

125

80002120

大陸地區 博士論文叢刊

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

（四川大學博士論文）

著	者	：	劉	復	生
發	行	者	范	惠	美
出	版	者	文	津	社

地 址：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02) 3635008

傳 真：(02) 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811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七 月 初 版

印 數：500本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台幣 200元

ISBN 957-9400-84-9



作者簡介

劉復生，一九四九年生於成都，原籍四川忠縣。一九七八年春季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四年獲碩士學位（民族史專業），一九九〇年獲博士學位（中國古代史專業），現在該系任教。自一九八一年以來，發表有《邵雍思想與老莊哲學》等十餘篇論文。

序 言

儒學思想源遠流長，由於它所留下的豐富遺產，迄今對我們仍為極富魅力的探討課題。儒學以它的兼容性，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斷地發展和變化，因時之宜，隨時而新。如其在漢代的神學化，或其在宋代的哲理化，都以不同的思想色調顯現而盛行於世。

本論文所要剖視研討的，正是儒學哲理化的「史前」時期，亦即我們所說的「北宋中期」。具體而言是指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期（公元 1023—1085 年），而又以仁宗慶曆（公元 1041—1048 年）前後為論述重心所在。

儒學自東漢以後，經歷了一個相對的沉寂時期。在唐代，出現了儒、釋、道「三教」並立的局面。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的劇變造就了衆多的新型學者和思想家，他們鄙棄漢唐儒生拘守章句訓詁、與治道相脫離的學風，將眼光心思轉向到對儒學義理的探索，並企求改造社會和服務於現實。他們希望恢復儒學的獨尊地位，「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於是儒學復興思潮跌宕起伏，漸成高潮。這種有異於漢代經學的新儒學，或總名之為「宋學」，它包括有許多派別。具有很大影響的理學是胎動於北宋中期儒學復興思潮而形成其後的一個學派。

這種思潮發軔於中唐，大盛於北宋，慶曆前後，正是新舊交爭且新儒取代舊儒這一大趨向的關鍵歲月。新儒們高唱變通之曲，要用儒家經邦濟世的實踐來改造現實，於是在社會的各個領

域內掀起了以新儒學思想為標誌的復興運動，或復古，或創新，或借復古以創新。我們當代學者重視理學，研究論述者不乏其人，然於理學所胎息的前鋒時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尚少全面深入的考查，爰作此篇，乞有識者不吝賜教。

本文是我的博士論文，出版時作了少許修訂。

一九八五年秋，我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古代史專業，從徐中舒教授、吳天墀教授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徐師耆年碩德，學識精深，旋因病重，遂難領教澤，論文由吳師指導下完成。吳師性喜深思，力學不倦，早年撰有《中唐以下三百年之社會演變——慶曆變革與近世社會之形成》（未刊稿）的長篇論著，我有幸獲讀，加以問疑接談時多，實深受啓迪。謹此，向業師敬致謝忱之意，並向三月前逝世的徐中舒師深表哀切之懷！

一九九〇年元月，經由著名思想史專家張豈之教授主持下舉行了論文答辯會。在論文撰寫過程中，還得到徐規教授、胡昭曦教授、蒙默教授、張勛燎教授、王文才教授的幫助和指教。在此向以上諸位老師致以衷心的感謝！

本論文交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對總編輯邱鎮京先生關心學術文化事業的盛意和陳義芝先生的熱心惠助，均致謝忱！

作者

一九九一年四月

目 錄

序言	1
第一章 儒學復興運動的產生及其特點	1
(一)中國社會在唐宋之際的劇變	1
(二)儒學史上疑經思潮的湧現	4
(三)「學統四起」與儒學復興運動的特點	13
第二章 反佛老思潮的高漲	29
(一)佛老勢力在唐末宋初的消長	29
(二)宋仁宗時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點	35
(三)張載、二程之闢佛老	46
第三章 古文運動的再起與儒學復興思潮	61
(一)宋初文壇的兩種風向	61
(二)古文運動的再起與儒學的復興	65
(三)以儒家之道為中心的古文運動	71
(四)政教中心論的復甦	77
第四章 史學更新與儒學復興思潮	87
(一)史學風氣的變化	87
(二)史論新特點	94

(三)《新唐書》和《新五代史》	104
(四)《唐史記》、《資治通鑑》和《唐鑑》	112
第五章 政風之變與政治革新	125
(一)北宋前期的政治風尚	125
(二)政風之變與儒學思潮	132
(三)從慶曆新政到熙寧變法看儒學思潮的影響	142
第六章 興學運動與儒學復興思潮	155
(一)由私學到官學和地方立學	155
(二)從慶曆興學到熙豐教育改革	162
(三)從興學運動看儒學思潮的影響	172
第七章 儒學思潮影響下的科舉改革	189
(一)宋初科舉制度的發展	189
(二)北宋中期科舉改革進程	193
(三)從科舉改革的發展脈絡看儒學思潮的影響	203
第八章 理學是儒學復興思潮的產物	209
(一)儒學復興運動的分裂	209
(二)理學是新儒學派別中的一家	215
(三)理學是新儒中的新儒	221

第一章

儒學復興運動的產生及其特點

北宋中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基於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而產生。社會呈現出長期的動蕩和戰亂，各階層、各集團賴以維繫的綱常倫理蕩然無存。官方所持操之舊有學術思想，未能對新的社會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一些崇奉儒家學說的思想家努力探究儒學義理，希望通過重新闡釋儒家經典並以之為綱，重新建立起儒家的「王道」政治。

(一)中國社會在唐宋之際的劇變

以唐代中葉安史之亂為標記，中國社會處在急遽的變化之中。這種變化大約經歷了二三百之久，在北宋時期基本定形，從而呈現出新的社會面貌。如果把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從唐中葉到五代算是變化的過渡時期，那麼從宋代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開始進入了它的後期階段。

宋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是空前的，可以說是遠遠超過被人稱道的漢唐。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兩項，即活字印刷術和指南針的發明都是北宋的事。雖然造紙術始於漢、火藥始於唐，但在宋代，二者得到了廣泛的利用，這些正是在前所未有的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之上，科學技術大大提高才開放出來的奇葩。專家們估

計，北宋晚期人口已突破一億大關。冶鐵技術和鐵製生產工具在此時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墾田總數擴大，單位產量提高，均已創造了我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時也處於當時世界的先進行列。

宋代社會經濟的進步主要是在封建生產關係的某些變革的基礎上取得的。均田制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租庸調制完全崩潰，而私人土地所有制日益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兩稅法之被制定，顯然就是社會劇變在經濟領域裏的深刻反映。宋代農民與前代相比，生產積極性相對提高。除少數地區外，租佃關係在全國範圍內已佔有了主導地位。各種形式的國家土地所有制崩潰後，國家對荒地不再嚴格控制，對少數官田也往往採取租佃形式經營。農民從對國家或豪強地主的強烈依附關係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有了更多的生產自主權和遷徙自由，實物地租代替了勞役地租而居於主要形式。農民有了更多的剩餘產品投放市場，加之手工業生產者也發生了類似農民的變化而刺激了生產，宋代的商品經濟從而空前活躍。

唐中葉以後，隨著舊有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發展，事實上已形成了「不立田制」的新的土地制度。在宋代，這種制度穩定下來，王朝政權公開肯定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①「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②私人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讓渡十分頻繁，法律為保證這種「私相貿易」（葉適語）的條規也日益詳備和規範化。漢唐時期被稱為「豪民」或「兼併之徒」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宋代已普遍地稱為「田主」了。^③這種新的土地制度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應該有它的積極一面。它能夠由此長期延續下去，說明了它所具備的生命力。但是，這種政策首先對構成宋代地主階級主體的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與唐代以前的門閥士

族等身份性地主相對而言）有利，它也就必然會引起新的社會矛盾。「不抑兼併」政策加速了土地的轉移、集中和農民的破產，與之相應的「據地出稅」的賦稅制度形似公允，但在實施過程中，強宗巨室「隱田漏賦」卻成為普遍的事實，大量的國家賦稅負擔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這不但加劇了宋廷長期存在的「財政拮据」現象，「賦役不均」的問題也未能當然也不可能克服。加以與北方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之長期爭戰，宋王朝不得不為之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凡此種種，使北宋王朝經常處於深刻的社會危機之中。在仁宗慶曆（1041—1048）前後，內憂外患，形勢嚴峻，社會矛盾呈現爆炸性，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中唐以後，王朝政治出現了類似春秋時期王權失落的現象，藩鎮跋扈，綱紀蕩然。降及五代，統治者更是走馬燈似的興滅無常。五十三年之間，五姓十三君，替換之速，歷代少有。十國林立，各霸一方，疆土割裂之劇，於史罕見。在長期的變亂特別是唐末戰爭的猛烈打擊下，舊來嚴於士庶尊卑之分的門閥社會和部曲奴客制度，便徹底分崩離析了。經歷長期混亂建立起來的趙宋王朝，為了免蹈覆轍，加強統治，在政治制度方面厲行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以強本弱枝。統治者深知「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①的道理，實行「興文教、抑武事」^②的國策。同時廣泛收羅社會人才，以加固和擴大統治的基礎。在意識形態方面，宋初統治者既高唱三教合一之論，也力圖重振倫理綱常之教。這樣，由於趙宋王朝處心積慮，採取各種措施，終能免於繼五代之後成為再一個短命王朝。但是，新王朝仍然不能克服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鬥爭，作為社會生產力之主要代表的農民階級提出了「均平」的要求，這無疑是當時新的歷史條件的產物，反

映了新的時代精神。

面對著劇烈的社會變革，統治者除了在政策和制度上作某些調整之外，迫切需要一種解救社會危機，維繫整個社會的新的精神武器，需要建立起一套能對新的社會現象作出解釋的關於自然的、倫理的、道德的思想體系。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們進行著長期的摸索，終於發現並「找到」了這條道路，這就是：復興儒學、更興儒學。

(二)儒學史上疑經思潮的湧現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成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正統學術。後世儒者，莫不以解釋、闡述和研究儒家經典為依托，這便是所謂「經學」。在長達約兩千年的歷史中，各個歷史階段的經學留下了不同的時代印記，這為我們考察不同時代的學術思想和歷史提供了素材。始於中唐而勃興於北宋時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引人注目地展現出來，它以懷疑傳統經學為起點，終於匯成了強大的思想解放潮流，成為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學術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南北朝時期，經分南北，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唐太宗有感於此，乃命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名曰《正義》。永徽四年（653）頒於天下，以之作為考試的標準，天下奉為圭臬。清末經學家皮錫瑞論云：「唐至宋初數百年，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謂之「經學統一時代」。^①這與李氏建立的唐王朝這個統一帝國的政治現實是相適應的。其治經方式，一承東漢古文學多詳章句訓詁的傳統，屬於「漢學」範疇。但是

到了中唐，政治上的危機日漸暴露，篤守義疏的經學傳統也被打開了很大缺口。《新唐書》卷二百《啖助傳》云：

大曆（766-779）時，（啖）助、（趙）匡、（陸）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萑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

說明義疏章句之學已受到普遍衝擊。其中啖、趙等人考《春秋》三家短長，在開「蹈空說經」之風中影響最大，《新唐書·啖助傳贊》繼云：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

啖、趙等人對舊傳統的挑戰成為經學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宋人晁公武言：

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⑦

唐啖、趙之後的呂溫有《與族兄臯請學春秋書》一文，他指舊經學是「儒風不振」的表現，闡述了對儒家《六經》的全新理解，聲明對於那些「非聖人之論，不與於君臣父子之際，雖欲博聞，不敢

學矣」。並說：

夫學者，豈徒受章句而已，蓋必求所以化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終身。夫教者，豈徒博文字而已，蓋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禮義，敦之以信讓，激之以廉恥，過則匡之，失則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無瑕。⑧

呂溫之言，代表了鄙視章句義疏之學，直追儒經大義的新儒精神。韓愈《寄盧仝詩》有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亦此之謂也。

但直到宋初，士子謹守官書的風氣仍沒有根本的改變，特別是在科舉考試中更是如此，傳統經學仍然佔居統治地位。雍熙二年（985）正月，太宗下令：「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⑨景德二年（1005）三月科試，試題有論「當仁不讓於師」，舉子李廸落韻，而賈邊釋「師」為「衆」，與經疏異。參知政事王旦認為：「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於是取廸而黜邊，史臣云：「當時朝論，大率如此。」⑩正如皮錫瑞所言：「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⑪

雖然傳統的力量仍佔優勢，但新儒精神卻在入宋後得到繼承和發揚。柳開是宋初傳播新儒精神的突出代表。張景稱他「凡誦經籍，不從講學，不由疏義，悉曉其大旨。注解之流，多為其指摘」。⑫石介也稱讚他「《六經》皆自曉，不看注與疏」。⑬咸平（998—1003）時，邢昺主持校定羣經義疏，對舊經學已有所改

造。^⑭又如孫奭，「患《五經》章句浮長，刪爲《節解》數百篇。取《九經》之要，著《微言》五十篇。」^⑮景德四年（1007）七月眞宗曾對臣子說：「近見詞人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說。」^⑯可見不囿於舊說發表己見，已逐漸爲時所尚。

至仁宗時期，思想風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傳統的義疏章句之學已普遍不爲儒者所重視，甚至受到了公開而嚴厲的斥責。有代表性的言論如王令在《答劉公著微之書》中所云：

今夫章句之學，非徒不足以養材，而又善害人之材。今夫窮心劇力，茫然日以雕刻爲事，而不暇外顧者，其成何哉？初豈無適道學古之材，固爲章句之敗爾。

自章句之學興，天下之學者，忘所宜學而進身甚速。忘所宜學，則無聞知；進身甚速，則謀道之日淺，甚者不知誦經讀書何以名學，徒日求入以仕。^⑰

固守義疏章句，約束了人們的思想，打破僵化的傳統經學，成爲復興儒學的迫切任務。宋儒不獨不迷信傳注，進而對經文本身也進行了大膽的懷疑。直抒胸臆，發明經旨，在北宋中期匯而成爲強勁的洪流一發而不可止，這便是今人稱之爲的疑經思潮。

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最富影響的代表人物有如下幾位：

一是孫復（992—1057）。其著《春秋尊王發微》，「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⑱是書闡發《春秋》之微旨，其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爲主。……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

實自復始」。⑩《四庫》館臣此論，正好說明孫復在疑經思潮中的重要作用。他為仁宗講說《詩》，也被守舊者指為「多異先儒」。⑪孫復在給范仲淹的一封信中，幾乎對舊注的權威性提出了全面的挑戰，並要求對舊注「重為注解」，其文云：

專主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於大《易》，吾未見其能盡於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寧之說而求於《春秋》，吾未見其能盡於《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於《詩》，吾未見其能盡於《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於《書》，吾未見其能盡於《書》者也。彼數子之說，既不能盡於聖人之經，而可藏於太學行於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於舊之注說而已。……執事亟宜上言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於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之古今，復其歸趣，取諸卓識絕見大出王、韓、左、穀、公、杜、何、范、毛、鄭、孔之右者，重為注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於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⑫

石介傳孫復之學，對舊傳注也多有斥責，如《憂勤非損壽論》斥「康成之妄」，《與張洎進士書》言《春秋》三傳、董仲舒、孔穎達等均「不能至《春秋》之蘊」。⑬與孫、石共稱為「慶曆三先生」的胡瑗亦頗鄙薄章句之學，云：「章句細碎，不足道也。」薛良齋在《與朱元晦翁書》中指出：「不出於章句誦說」乃胡瑗之傳的學風。⑭三人講學於仁宗之世，在疑經思潮中起有重要的作用。

再一位是歐陽修（1007—1072）。他著《易童子問》三卷，認為「《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包括《十翼》中的《說卦》、《文言》